

【文学研究】

# 古汉语的“N+N”结构及其发展

张文国

(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, 山东 济南 250014)

**摘要:** 古汉语的“N+N”结构是指“君君”、“臣臣”一类的主语和谓语均由同一个名词构成的句法结构。先秦汉语“N+N”结构中的“N”只能是单音节,“N+N”结构具有很强的粘合性,具体表现在“N”的前后均无修饰限制或补充说明的成分。“N+N”结构一般成对出现,前后对举出现的“N+N”结构中的两个“N”意义相对。“N+N”结构不能独立成句,或者充当主语,或者作复句的前分句。汉代以后,“N+N”结构的粘合性减弱,并且出现了一些新语法功能,比如作谓语、定语、补语等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,能够进入“N+N”结构框架的“N”全部是具有强社会性语义特征的名词,其社会文化附加义是“N+N”结构之所以成立的最根本的语义基础。

**关键词:** 古汉语;“N+N”结构;发展;文化附加义

**中图分类号:** H109.2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671-6248(2006)02-0080-04

##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in ancient Chinese

ZHANG Wen-guo

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, Jinan 250014, Shandong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in ancient Chinese is the one that is formed by a subject and a predicate which the same noun plays the part in, for example, Junjun Chenchen. The noun in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in Pre-Qin Chinese is only monosyllabic.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is very agglutinative. There are often two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of “N+N” which stands side by side. It can not become a sentence by itself. It may play the part in a subject or a subordinate clause. After Han Dynasty, the agglutination of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is much weakened. Some new syntactic functions come into being, for example, a predicate, an attribute and a complement, etc. According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, all of the nouns which can get into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have a strong cultural meaning which is added. And the strong cultural meanings which are added are the most essential semantic basis that the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 can hold water.

**Key words:** ancient Chinese; syntactic construction of “N+N”; development; added cultural meaning

## 0 引言

古汉语“N+N”结构是指主语和谓语均由同一个名词充当的结构,其否定形式是“N+不+N”,即在主谓之间加否定副词“不”,如《论语·颜渊》中: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

子。”公曰:“善哉,信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虽有粟,吾得而食诸?”此例中“君君”、“臣臣”、“父父”、“子子”为其肯定式,而“君不君”、“臣不臣”、“父不父”、“子不子”则为其否定式。对于此种结构,时贤注意较少。传统的做法是把第二个名词看作活用作动词<sup>[1]</sup>,但也有人把这种结构看作是古汉语的

收稿日期: 2005-11-28

基金项目: 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(03BYZ01)

作者简介: 张文国(1967-),男,山东沂水人,教授,博士后。

一种名词谓语句<sup>[2]</sup>。至于这种结构的形式特点、语法功能、语义特点及其发展变化,无论是哪种做法都很少论及。但这种结构在古汉语中比较常见,也比较特殊;而且到了现代汉语,除了“人不人,鬼不鬼”等极个别的残存说法之外,这种结构已经消失。因此,很有必要对古汉语的“N+N”结构及其发展作一探讨。

## 1 “N+N”结构的肯定式及其发展

先讨论先秦汉语“N+N”结构的肯定式,如:

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中:子皙盛饰入,布币而出;子南戎服入,左右射,超乘而出。女自房观之,曰:“子皙信美矣,抑子南夫也!夫夫妇妇,所谓顺也。”

《国语·晋语四十》中:事君不贰是谓臣,好恶不易是谓君。君君臣臣,是谓明训。明训能终,民之主也。

《荀子·王制》中:君臣父子兄弟夫妇,始则终,与天地同理,与万世同久,夫是之谓大本。…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,兄兄弟弟,一也;农农士士。工工商商,一也。

《周易·家人》中:家人,女正位于内,男正位于外。男女正,天地之大义。家人有严君焉,父母之谓也。父父子子,兄兄弟弟,夫夫妇妇,家道正而天下正矣。

先秦汉语中,能够出现在此种句式中的“N”只能是单音节普通名词,没有多音节的用例。无论是作主语,还是作谓语,“N”前均不会出现任何修饰限制性成分;作谓语的“N”后也不会出现任何补语或语气词,这些都说明“N+N”结构具有很强的粘合性。“N+N”结构必须成对地出现,不能单独出现,至少要有一对“N+N”结构同时出现,如“夫夫妇妇”和“君君臣臣”;可以是两对,如“农农士士”和“工工商商”;最多可以并列出现3对“N+N”结构,如“君君臣臣”、“父父子子”、“兄兄弟弟”和“父父子子”、“兄兄弟弟”、“夫夫妇妇”。正因为如此,没有发现“N+N”结构并列出现时是奇数的情况,比如根本不会存在类似“父父子子兄兄弟弟”3个“N+N”结构并列出现的情况。成对出现的前后两个“N+N”结构中的“N”一般在意义上都是相对的,如“君”与“臣”、“父”与“子”、“兄”与“弟”、“夫”与“妇”等。由两个意义相对的名词构成的前后两个“N+N”结构互相参照,正好说明了某个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。比如“君君”和“臣臣”、“父父”和“子子”、“兄兄”和“弟弟”、“夫夫”和“妇妇”就分别说明了君

臣之间、父子之间、兄弟之间、夫妇之间的正常关系。在此,每组“N+N”结构均表示了“五伦”(旧指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朋友之间5种伦理关系,也称“五常”)中某一种正常的人伦关系;这也同时解释出了“N+N”结构为什么必须成对出现。“N+N”结构不能独立成句,它们或者并列作主语;或者充当复句的前分句。“N+N”结构的这个特点是与其作主语的“N”有关。因为汉语的主语是倾向于有定性的<sup>[3]</sup>,而作主语的“N”却正是没有定性。

在后世的文言文中,“N+N”结构除继承了先秦汉语此种结构的上述特点之外,又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用法,如:

《新唐史·孝友传》中:父父也,子子也,兄兄也,弟弟也,推而之国,国而之天下,建一善而百行从,斯人则以法绳之。

《汉书·爰盎晁错传》中:岂如今定经制,今君君臣臣,上下有差,父子六亲各得其宜,奸人无所几幸,而群臣众信,上不疑惑!

《晋书·儒林传》中:我高我曾重光累徽,我祖我考父父子子,汝为我对,正值恶抵。

《新唐史·烈女传》中:今采尤显行者著之篇,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。

《新五代史·唐废帝家人传》中:甚矣,五代之际,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,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,斯可谓乱世者欤!

“N+N”结构的“父父”、“子子”等后面带上了语气词“也”,而语气词是主谓结构自足成句的一个标志<sup>[4]</sup>。也就是说,“N+N”结构在此能够独立自足成句了,这是先秦汉语中此种结构所不曾有的功能。“君君臣臣”出现在使动词“令”后,说明前一“君”、“臣”做“令”的兼语,后一个“君”、“臣”仍然做谓语。后带语气词独立成句和出现在使动词后这两种功能的变化,同时还说明了“N+N”结构的粘合性已经减弱。“父父子子”充当“我祖我考”的谓语。“父父子子夫夫妇妇”和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分别充当“懿”和“道”的定语,定语之间都加结构助词“之”。作兼语、谓语、定语,都是后世文言文对“N+N”结构的创新。究其根源,不过是对其他主谓结构的类比罢了,因为其他主谓结构能够充当这些句子成分。

## 2 “N+N”结构的否定式及其发展

下面再讨论先秦汉语“N+N”结构的否定式,如:

《谷梁传·宣公十三年》中: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,是不臣也;为人君而失其命,是不君也。

君不君,臣不臣,此天下所以倾也。

《论语·颜渊》中:公曰:“善哉,信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虽有粟,吾得而食诸?”

《论语·雍也》中:子曰:“觚不觚,觚哉,觚哉!”

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中:陷君于败,败而不死,又使失刑,非人臣也。臣而不臣,行将焉入?

《国语·齐语》中:桓公召管子而谋,管子对曰:“为君不君,为臣不臣,乱之本也。”

《管子·形势》中:君不君,则臣不臣。父不父,则子不子。上失其位,则下逾其节。上下不和,令乃不行。

先秦汉语中,“N+N”结构的否定式与其肯定式相同,“N”也只能是单音节名词。“N+不+N”一般也要成对出现,并且不能独立成句,或者充当句子成分;或者作复句的分句。不同的是,“N+不+N”结构的粘合性比“N+N”弱得多,作主语的“N”后可以添加连词“而”,如“臣而不臣”;主语“N”之前还可以添加动词“为”,让为“N”作主语,如“为君不君”和“为臣不臣”。个别的“N+不+N”结构还可以单独出现,如“臣而不臣”。与“君不君”“臣不臣”等不同,“觚不觚”只能单独出现。这是因为语言中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与“觚”意义相对的词,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与“觚不觚”对举出现的“N+N”结构。另外,“N+不+N”结构出现的次数比“N+N”明显要少得多。句中每对“N+不+N”结构之间可以加上连词“则”字,构成一个假设复句,如“君不君,则臣不臣”。但是,该例句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,因为根据近人研究,《管子》一书是秦汉时人的假托之作。的确,“N+不+N”结构的这种用法只有到了汉以后的文献中才频繁出现,也可以证明此种观点。这一点在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。

在后世的文言文中,“N+不+N”结构却大量出现,而且与“N+N”结构相对应,在用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,如:

《隋书·列传第五十序》中:然则君臣父子,其道不殊,父不可以不父,子不可以不子,君不可以不君,臣不可以不臣。

《旧唐史·韦湊列传》中:夫君或不君,臣安可不臣?父或不父,子安可不子?借如君父有桀、纣之行,臣子无废杀之理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六》中:孚不肯受教,伏地仰谏曰:“君虽不君,臣不可不臣,明府奈何令孚受教,敕外收本邑长乎?更乞授他吏。”

《旧唐史·李重福列传》中:集州刺史譙王重福,

幼则凶顽,长而险波。幸托体于先圣,尝通交于巨逆。子而不子,自绝于天。

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中:故父不父则子不子,君不君则臣不臣,虽有粟,吾岂得而食诸!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: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三》中:故有君不君,臣不臣,上下不通,心怀郁结,使阴阳不和,灾害屡降,凶恶之徒,因间而起,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?

《说苑·复恩》中:春秋者,记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者也;此非一日之事也,有渐以至焉。

《隋书·五行志上》中:《洪范五行传》曰:“庶征之常,雨也,然尤甚焉。雨,阴也;雪,又阴畜积甚盛也。皆妄不妄、臣不臣之应。”时义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于魏,臣不臣之应也。

主语“N”后可以添加副词、助动词、连词等,说明“N+不+N”结构的粘合性减弱。主语“N”后添加有副词“不”和助动词“可”。“君”和“父”后都加入了副词“或”,“臣”和“子”后则加入了疑问代词“安”和助动词“可”。“君”后加入了连词“虽”,“臣”后加入了副词“不”和助动词“可”。“子”后加入了连词“而”。每一对“N+不+N”结构可以构成一个复句,“君或不君,臣安可不臣”和“父或不父,子安可不子”。“N+不+N”结构可以不成对而是单独出现,如前文中“君不君”、“臣不臣”、“父不父”、“子不子”和“臣不臣”。“N+不+N”结构的句法功能有所扩大,除了可以作主语外,还可以作补语,“君不君,……子不子”作“至”的补语,还可以作宾语、定语。

### 3 “N+N”结构的认知解释

古汉语中,能够出现在“N+N”结构中的名词是很有限的,常见的只有“君”、“臣”、“父”、“子”、“兄”、“弟”、“夫”、“妇”等8个,偶尔出现的还有“妾”、“觚”等。为什么只有这些名词可以出现在“N+N”结构中呢?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附加义。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,这几类人或事物均被赋予了特殊的行为道德要求。比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中:“君”,“君人者,岂以陵民?社稷是主。”《论语·八佾》中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《荀子·王制》中:“君人者,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,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,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。”《荀子·王霸》中:“君人者,立隆政本。”《荀子·君道》中:“爱民而安,好士而荣。”《荀子·王制》

中:“君者,善群也。”《荀子·君道》中:“君者,仪也,仪正而景正。”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,除了“君主”的概念义之外,“君”还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附加义:“社稷是主”、“使臣以礼”、“平政爱民”、“隆礼敬士”、“尚贤使能”等。研究发现,能够进入“N+N”结构框架的名词全部是具有社会性语义特征的名词;而且社会性语义特征的强弱决定了名词能否经常出现在“N+N”结构中。儒家有“十义”之说:“父慈、子孝,兄良、弟悌,夫义、妇听,长惠、幼顺,君仁、臣忠。”其中涉及的10个名词都具有强社会性语义特征。除“长”、“幼”兼有形容词的功能,不是纯正的名词,所以不能出现在此种结构中外,其他8个名词都能经常出现在“N+N”结构中。而前文中的“觚”,邢昺疏:“觚者,礼器,所以盛酒。二升曰觚。言觚者用之当以礼,若用之失礼,则不成为觚也。”其中后半部分“觚者用之当以礼,若用之失礼,则不成为觚也”可以看作是“觚”的社会性语义特征,但与“觚”这种东西本身关系不是太密切,只能算是弱社会性语义特征,所以它只是偶尔出现在“N+N”结构中。

“N+不+N”结构表示的是“N”具有不具有“N”所应有的儒家所规定的行为道德规范。实际上,作主语的“N”实现的是其概念义,而作谓语的“N”实现的是其文化附加义。所谓“物大抵有其象,而象字(“象字”大致等于今天的形容词——本文注)所形容者,往往不过其一部分:欲形容其全象或浑漠之象,必即以该名字为象,如用‘君君’、‘臣臣’第二之‘君’、‘臣’字,指具有君或臣所应具之德言,即象用也。”<sup>[5]</sup>可见,文化附加义是名词进入“N+N”结构的语义基础,它为名词进入“N+N”结构作谓语提供了可能性;而“N+N”结构又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。因为“N+N”结构并不是一种随机的句法形式,而是在语义上具有很强的选择性。一旦名词出现在谓语位置上,“N+N”结构就把名词的文化附加义提取出来,隐含掉其概念义。名词语义上的游移带来了其语法功能的转变,即可以充当描述性谓语了<sup>[6]</sup>。

对于“N+N”结构,传统的解释一般认为后一个名词作谓语活用作动词了。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因为理论上,表示人伦关系的名词,如“君”、“臣”、“妾”、“父”、“子”、“兄”、“弟”、“夫”、“妇”等都育旨出

现在“N+N”结构中,而“在一定的条件下,同类的词都能这样用,因而这种用法可以列入这类词的功能之内。”<sup>[7]</sup>也就是说,作谓语是人伦名词正常的语法功能,用来“形容其全象或浑漠之象”,即指出其“应具之德言”。传统上之所以把第二个名词看作是活用作动词了,根源仍然在于给词类和语法功能建立了全面对当的关系。比如,名词主要作主语、宾语等,动词主要作谓语。如果一个名词出现在谓语位置上,就说这个名词活用作动词了。殊不知词类和语法功能是两码事儿。可以说,每种词类都具有一种或两种以上较为固定的语法功能;却不能说具有某种语法功能的词就一定属于某种词类。比如汉语中,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作谓语,但不能说作谓语的词一定就是动词,因为名词、形容词也可以作谓语。“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。”<sup>[8]</sup>因此,应该摒弃词类和语法功能全面对当的做法。

## 4 结 语

“N+N”结构是古汉语特有的一种名词作谓语的句法结构<sup>[9]</sup>。此种结构在结构形式、语义表达和语法功能等方面都极具特色,能够反映古汉语“意合”型语法的某些本质特点。“N+N”结构之所以能够成立,也是与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特点分不开的。到了现代汉语,词汇已基本双音化,所以,“N+N”结构也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,从而也就消失了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王 力. 古代汉语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.
- [2] 杨伯峻, 何乐士.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[M]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1992.
- [3] 赵元任. 汉语口语语法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1.
- [4] 刘 顺. 影响名词谓语句自足的语言形式[J]. 汉语学习, 2001, 19(5): 41-44.
- [5] 朱德熙. 语法讲义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2.
- [6] 范 晓. 汉语的句子类型[M]. 太原: 书海出版社, 1998.
- [7] 吕叔相.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79.
- [8] 朱德熙. 语法答问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85.
- [9] 丁声树.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2.